



▲解決就業問題，需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職業培訓體系，從過去針對在職或失業人員，延伸至畢業生，持續進行技能更新。

經濟觀察家

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統籌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這三者各有其側重點，同時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本文試圖從經濟學的底層邏輯出發，釐清如何實現這三者的統籌兼顧，並剖析各自領域的重點任務所在。

如何統籌實現經濟三大目標

人口經濟
蔡昉

在三位一體的「統籌」中，為什麼首先強調「促就業」？這是由當前就業形勢的特點決定的。目前，中國就業領域正在發生顯著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促就業：三個結構性重點

第一，就業增量的「新形態化」。當前，新增就業中越來越大的比重表現為新就業形態，如零工經濟、平台就業等靈活就業。儘管不同口徑的統計數據略有差異，但總體趨勢是其佔比持續攀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個體就業、私營經濟僱員以及不屬於任何單位的就業，這三類形態加起來，構成了最接近於「非正規就業」的群體。這部分人群往往缺乏正規的勞動合同，社會保障覆蓋率較低，勞動權益保障相對薄弱。已有數據顯示，這類就業佔全部城鎮就業的比重已經超過60%，且仍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

上述狀況是自動化和產業結構變化的結果，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將進一步推波助瀾。AI對傳統崗位的替代將日益明顯，而被替代的勞動力往往會流向門檻較低的靈活就業市場；同時，AI創造的新崗位也呈現出靈活化特徵。就業形態的靈活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無法改變。唯一能做且應該做的，是不能讓「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與「非正規就業」畫等號。因此在社會保障制度設計、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以及勞動執法等各個方面，我們必須做出更大的努力。

第二，勞動力流動的「內捲化」。筆者在這裏使用的「內捲化」一詞，是指經濟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嚴格定義。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會在產業間、城鄉間、區域間流動，其動力源於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質量。宏觀上，這便表現為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如農業）向高生產率部門（如非農產業）轉移，從低生產率地區向高生產率地區轉移。如果由於技術、體制或其他因素，導致勞動力出現系統性的、大規模且持續時間較長的「逆向流動」，那麼整體生產率的提升速度必然放緩，就業質量降低，工資增長也會隨之停滯。從數據上看，這一趨勢已有所表現：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本世紀中國外出農民工的增長速度階梯式下降。2000年至2008年間，年均增長率高達17.5%；隨後的八年降至2.4%；而在過去這八年中，年均增長率僅為0.7%。這表明勞動力外出人數的增長已趨於停滯。

與此同時，外出勞動力的流動範圍正在縮窄。跨省流動的比例在下降，跨市流動的比例在下降，甚至跨縣流動的比例也在下降。這意味着，農民工雖然還在外出，但呈現出「速度放緩」和「本地化」的特徵。眾所

周知，大城市的勞動生產率通常是最高的，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鎮較低。勞動力流動的「本地化」趨勢，實際上意味着勞動力沒有流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和地區，這直接導致了生產率提升的放緩。

第三，就業重點人群的「年齡兩端化」。當前勞動力市場的困難主要集中在「一老一小」兩個端點。「小」指的是青年就業者。這部分人群雖然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但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在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初期，他們面臨較大困難。隨着人工智能，尤其是大語言模型的普遍應用，許多原本適合應屆畢業生的入門級技能崗位正在被AI替代。

「老」指的是大齡勞動力。數據顯示，勞動者的就業率在40歲左右達到頂峰，隨後開始逐漸下降。隨着年齡增長，由於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身體素質下降，大齡勞動力在就業市場上不再受到僱主青睞。此外，人工智能和數字化轉型使他們面臨巨大的「數字鴻溝」或「智能鴻溝」。與青年人不同，大齡勞動力的困難通常不表現為高失業率，而表現為更低的「勞動參與率」——因找不到工作，他們往往選擇直接退出勞動力市場。

解決上述兩類人群的就業問題，是公共就業服務的優先目標。我們需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職業培訓體系。過去的培訓主要針對在職人員或失業人員，現在的培訓體系必須延伸：青年學生畢業後可能第一件事就是接受崗位培訓，勞動者一生中需要不斷「回爐」、培訓以適應AI時代，大齡勞動者在延遲退休背景下也需要持續的技能更新。

增收入：兼顧增長與分配

在「增收入」方面，我們面臨着**雙重目標：一是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二是改善收入分配結構。**

首先，收入增長面臨自然減速的壓力。隨着中國人均GDP增長速度的自然回落，就業擴大不再像以前那樣強勁，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會相應下行。因此收入增加的難度正加大。

其次，如果缺乏強有力的政策干預，收入分配差距將產生再次擴大的趨勢。從數據來看，過去十幾年中，雖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一指標在持續下降，但不足以帶動基尼系數同步下降。基尼系數反映的整體收入差距，是由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以及城鄉差距構成的。既然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改善，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力度較大，農村收入差距並未擴大，可見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有擴大趨勢。這與前述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密切相關，與技術衝擊緊密相連——儘管人工智能的衝擊尚未完全顯現，但過去數年自動化和機器人的影響已足夠強烈。

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勞動報酬佔初次分配的比重、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雖然近年有

所回升，但仍未回到歷史高點，且顯著低於OECD（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表明，如果將基尼系數0.4以下、城鄉收入差距2.0以下設定為相對合理的收入分配目標，我們既要在初次分配環節努力，更要在再分配環節下大功夫。OECD國家的經驗顯示，將基尼系數降至0.4甚至0.3以下，歸根到底要依靠轉移支付和稅收再分配手段，僅靠初次分配難做到。

從目前來看，中國依靠這兩大手段調節收入分配的潛力仍很大。一方面，目前中國稅收結構中，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資本利得稅等具有明顯再分配功能的稅種佔比僅為36%左右。這一比例不僅低於幾乎所有的OECD國家，甚至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這意味着中國稅收制度的累進性質和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仍有提升空間。另一方面，我們更需要通過擴大轉移支付，按照更具普惠性的方向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擴大覆蓋率和均等化水平。

穩預期：制度建立是關鍵

「穩預期」的核心在於制度建設。我們強調兩個造成預期不穩定的因素。一是技術對就業的衝擊。2012年以來，雖然我們在不斷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但自動化的推進也破壞了大量舊崗位。這種「獲得崗位」與「失去崗位」並存的現象，導致新創造的崗位不能全部轉化為淨增崗位。

二是人口加速老齡化。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即將迎來「高齡化」挑戰。數據顯示，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佔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將逐漸提高。這不僅對延遲退休年齡提出新的挑戰，也大大增加了社會對養老、贍養和照護的需求。

如何穩定預期呢？歸根到底，我們並不缺乏資源，關鍵在於建立制度。舉一個例子，根據測算，從現在到2035年，中國的老年撫養比平均每年提高約4.6%。這看起來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如果我們考察GDP潛在增長率，並據此計算勞動年齡人口的生產率，可見其年均增長速度約為5.6%。也就是說，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速度完全可以跑贏老齡化的速度。更進一步，據一些權威智庫的估算，AI有望在2035年之前為GDP帶來額外20%的增長潛力。如果加上這一因素，勞動年齡人口的生產率甚至可能達到年均增長7%以上。

但是，「跑贏」並不代表老齡化問題得以自動解決。核心在於我們能否建立起一套「分享勞動生產率」的制度體系。這包括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以人為本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以及一系列配套的福利制度和社會政策。只有通過制度安排，確保**全社會成員能夠公平地分享勞動生產率提升帶來的紅利**，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焦慮，實現「穩預期」的目標。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深化改革創新 促進港金融發展



高文宏議

踏入新的一年，香港特區第八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筆者很高興連任成為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繼續為國家、香港和業界服務，致力提升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新一屆的議會工作，將積極履行議員的職責，繼續擔當業界與政府及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橋樑角色，協助業界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亦落實在選舉政綱內提及的三大範疇，包括：1）持續激活證券市場；2）提升期貨及衍生品地位；以及3）協助黃金全方位發展。

持續激活證券市場

為推進上市改革，筆者建議深化便利企業上市措施，包括檢討雙重存檔制度、關注FINI（香港首次公開招股電子化結算平台）對業界的影響，以及檢視現行上市盡職審查要求和「前置式監管」模式。市場改革方面，為進一步提升市場流動性，監管機構須加快落實股票手數改革和「港版」除牌公司場外交易（OTC）市場、推動「T+1」結算實施，以及為上市公司進行收購合併或反向收購(RTO)的相關規則拆牆鬆綁。

香港特區政府應積極扶助中小型公司上市，此舉可為中小型包銷商、保薦人及傳統券商等帶來更多業務機會。同時，筆者亦會協助業界發展各類投行、資管及財富管理業務；並持續跟進上屆立法會的立法議題，包括虛擬資產託管服務發牌制度、場外固定收益及貨幣衍生工具制度、優化單一家族辦公室的優惠稅制和強積金「全自由行」等。

此外，為使證券業順利過渡至新推出的無紙證券市場制度，建議政府向券商（尤其是中小型券商）推出資助計劃，以紓緩和協助業界應對可能引申的新增收費；亦可研究設立專項基金，資助業界為符合監管新規而進行的系統升級和員工培訓等，以減輕合規成本。

提升期貨及衍生品地位

為提高香港期貨及衍生品在環球市場的競爭力，筆者會努力推動香港特區政府、證監會及港交所提升對期貨業發展的重視，亦敦促期交所盡快實現23小時交易、進一步豐富商品期貨產

品。港交所亦應盡早檢討和優化清算制度，包括證券、期貨及股票期權跨產品按金安排；以及加強對期貨業的宣傳推廣，並為業界增設激勵計劃，更大力度刺激期貨產品交易。

與此同時，政府亦須持續與內地監管部門商討深化互聯互通機制，包括推出「新股通」、「期貨通」、「商品通」及「牌照通」；並且促進產品零售化，以及產品種類和服務多元化發展。

協助黃金全方位發展

為加快構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筆者會致力協助香港黃金交易所配合國家及香港特區政策，並更好對接上海黃金交易所；推動政府加強與香港黃金交易所在交易、清算及黃金標準制定上的溝通和合作；優化現時傳統及創新產品的法律和監管規定；以及除了增加香港品牌的實物黃金作為外匯儲備外，亦可持續增持香港實物黃金ET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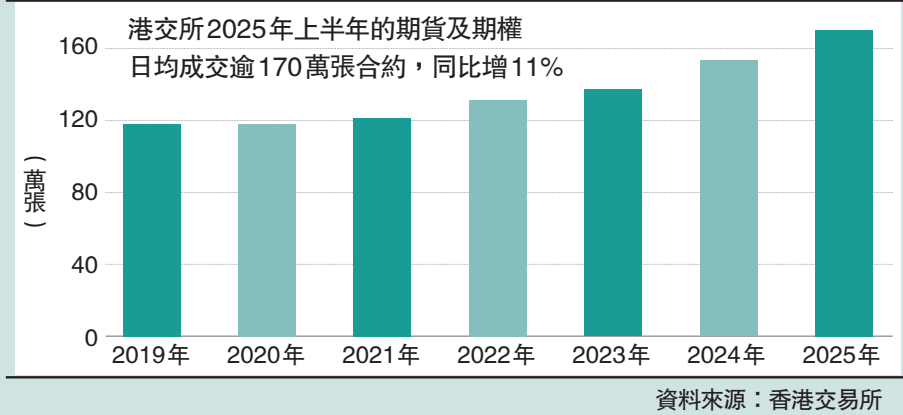
筆者建議加強業界了解及參與黃金相關的創新產品，包括促進資產代幣化，並且改善黃金交易及投資模式，增加市場參與度。同時，金管局亦須推動銀行保持友善態度對待貴金屬及數字資產的營運者，尤其是在銀行開戶及相關後續服務方面多加關注。

期望政府積極考慮上述建議，共同推動香港金融服務業向前發展，增強發展動能，鞏固香港「八大中心」定位，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和確保經濟持續發展。（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議員）



▲業界建議港交所加大力度刺激期貨產品交易。

港交所衍生品合約日均成交量（2019至2025年上半年）



香港經濟呈穩步向好



樓市新態

最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兩次發言，筆者歸納了當中七點談話，十分有討論價值，亦是筆者一直關心的：

1）樓價和供應：「政府研判住宅樓價穩步地緩慢增長。一直緊貼住宅樓市情況，政府在土地供應方面很審慎。」筆者明白政府立場必須要保守的，既然如此，財爺肯確認樓市穩步增長，當中亦反映樓價回升的態勢已穩定。

2）關於人才及買樓需求，財爺說：「由2022年底至今，各類人才計劃合共收到56萬宗申請，39萬宗獲批核，已來港人士介乎29萬至30萬。這些人才大多會先租屋，相信當中部分會轉租為買，買樓需求是存在。」的而且確，外來人口增加令租金合理地長期上升，亦令買賣市場長期增加了買家。這是結構性優勢，人口充足不單只保持到就業人數，更對本來老年化的香港人口結構，得到「年輕化」的改善，這個趨勢如果不變，對香港社會和市場長遠也很大裨益。

3）在息口方面，財爺說：「不預期美國未來會有大幅度減息，但減息次數至少還會有多一兩次。」筆者同意這個保守又實在的看法，投資或者供樓最重要是避免失預算。

4）「對於寫字樓物業市場恢復較平穩狀態相當有信心。瑞銀預租高鐵西

九龍站IGC一幢14層寫字樓，阿里巴巴在港島壹號中心買入多層物業。」這點筆者曾分析過，寫字樓市道雖仍慘淡，但也已露曙光。IGC可望令西九「再中環化」，成為高尚寫字樓的殿堂，西九雖沒有CBD（中央商務區）的體積，但正好配合緩慢回復中的經濟。

5）「受惠於金融市場表現帶動稅收增加，本財政年度經營賬目有望錄得盈餘，將是過去數年赤字後首次重返盈餘。」的確，金融中心地位正是香港活力重生的關鍵，影響不單是「錢財」，更是「人才」等重要實力之源！

6）關於財政的困難：「同時亦需進行多項基建工程，導致綜合賬目面臨一定的赤字壓力。」筆者認為財爺要多分享難處，令市民知道，這對團結民心有幫助。

7）「政府透過『加強版財政整合計劃』，以節流為主、開源為輔，致力控制公共開支增長速度，目標盡快令經營賬戶恢復盈餘。在整合過程中，民生開支如醫療、社福、教育等並未減少，今年相關經常開支佔比仍達59%。面對人口高齡化挑戰，政府將採取精準措施應對，秉持『能者共付』原則，同時確保一般市民生活需要獲得適當照顧。」對，理財從來都是審計題，不是純粹省錢就可以！在不同項目上改革令效率更高，最重要的是不要影響優秀的項目發展，以及貧窮草根市民相關的服務和費用。

（作者為祥益地產總裁）